

解讀博古、毛澤東、周恩來的 三邊關係

——評《博古和毛澤東》(下篇)

● 高 華



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
(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

在1930年代初的共產黨領導人中，博古屬於資歷較淺的年輕一輩。他於1930年9月從蘇聯回國，在上海中共所屬的全國總工會做幹事，和王明、王稼祥一起反「立三路線」及周恩來、瞿秋白的「調和路

線」。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博古出任共青團中央書記。因顧順章、向忠發相繼叛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處境十分危殆，中共主要領導人準備撤離上海。9月，王明、周恩來指定博古擔任新成立的臨時政治局負總責，並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博古在當年雖然是中共總書記，可是知名度卻不高。王明、博古何許人也，白區的黨員不知道，甚至蘇區的幹部戰士也沒聽說過。毛澤東幾十年後對斯諾(Edgar Snow)說，完全不搞個人崇拜就要垮台，用到博古身上是絕對正確的。

博與毛，誰是誰非？若以成敗論英雄，答案是現成的。毛澤東是開國之君，博古早被其打垮，後者之「錯誤」且寫在官書中，已是鐵板釘釘。只是歷史更複雜，非線條般簡潔明晰。

一 當年的國民黨如何看待博、毛、周？

博與毛，誰是誰非？若以成敗論英雄，答案是現成的。毛是開國之君，博古早被其打垮，後者之「錯誤」且寫在官書中，已是鐵板釘釘。只是歷史更複雜，非線條般簡潔明晰。如今，博古的親屬寫出書



博古

來(以下簡稱秦書,引用只註頁碼),就江西一段,舉出了博古幾個方面的「是」。秦書說,博古最大優點在於不擅權,不是獨斷專行之輩,此說大致可成立。該書還說,博古負責中央紅軍大轉移的秘密準備工作是成功的,此說也是正確的,國民黨方面的資料也證實了這點。1934年10月10日,中央紅軍開始突圍,國民黨方面竟然到「十月下旬才得到情報」。當年負責江西剿共,「收復瑞金」的陳誠就承認:「共軍封鎖情報的工作十分成功,因此才有突圍的成功。」他喟嘆:「剿共數年,卒使共黨份子數萬突圍,這是我們的失敗」,「竭數年之力,糜巨萬之餉,勞百萬之師」,到了最後收尾階段,「共黨竟開始突圍,其中渠魁如朱、毛等,盡皆漏網,遂使九仞之功,虧於一簣」;陳誠甚至自責道:「這讓我們當時剿共有責的人,真不知應何以自處!」^①

秦書也不諱言博古之錯,指出其最大的「錯」在於不懂軍事,聽信甚至縱容李德。至於博古其他的

「錯」,作者都是照搬〈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只是此書和〈歷史決議〉一樣,未點出博古問題的真正實質,乃是他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理人。

2003年在俄羅斯出版的共產國際與中共往來電報清楚無誤地證明了這一點。博古擔任總書記的幾年,在一切重大問題上都執行了共產國際的路線,甚至六屆五中全會的決議案也是共產國際遠東局駐上海代表埃韋特(Arthur Ewert)起草的^②。博古主政中共期間,舉凡一切重大政治、軍事方面的方針政策,都事先請示或事後向莫斯科做了匯報。比較重大的幾件事,事先請示的有:臨時中央請求遷往中央蘇區,伊思美洛夫(張聞天)要求前往中央蘇區^③,擬擔任五中全會的政治局委員及書記的名單;事後匯報的有:寧都會議上的爭論等。

博古在中共黨內執政前後四年,可分前後兩段:前段在上海(1931年9月至1933年1月),後段在江西(1933年1月至1935年1月)。秦書幾乎沒有交代前段博古做的工作,這是該書的一大不足。這個時期是中共在上海最困難的時期,周恩來去了蘇區,王明去了莫斯科,博古以一個二十四歲的小青年擔任中共總負責人。秦書說,博古受命於危難時期,這是成立的。在國民黨特工組織逮捕、威脅的險惡環境下,到了1932年12月,就在博古去蘇區前一個月,上海中央機關還有大約一百人,主要從事聯絡、印刷、保衛等工作^④。

面對領導中央的繁重工作,博古其實很盼望王明早點回國,1932年

博古擔任總書記的幾年,在一切重大問題上都執行了共產國際的路線。舉凡一切重大政治、軍事方面的方針政策,都事先請示或事後向莫斯科做了匯報。

3月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即臨時中央）給共產國際發電報，請求「伊萬洛夫（王明）立即回來擔任領導工作」^⑤。共產國際也一直考慮王明回國的路線，同年12月21日，甚至指示急於要開五中全會的中共中央：五中全會一定要等王明進入中央蘇區才能召開，而且要由王明擔任全會的主要報告人之一^⑥。次日，又電問中央，王明是否可直接去香港？可否把王明夫婦從香港接到中央蘇區^⑦？後因返回的安全性無法確保，王明一直沒能回國，一直到了1937年11月才回到延安。

在上海時期，博古主要做了以下的工作：

- (1) 保持與共產國際的電台聯絡，另在上海與國際代表溝通；
- (2) 指導上海與全國的工運、兵運；
- (3) 保持與江西和其他蘇區的地下交通線，以電台指導江西蘇區的工作；
- (4) 應付國民黨「中統」對上海及白區黨組織的破壞。

在這幾項工作中，最有成績的是保持上海和中央蘇區以及與蘇聯的秘密電訊和地下交通線的暢通。1932至1934年間，在國民黨特工組織的破壞和威脅下，上海地下電台與蘇區的聯繫雖然經常中斷（或重新建立聯繫），但在瑞金和上海的電報聯繫相對比較穩定。臨時中央通往莫斯科的電報是由在上海的共產國際聯絡部代表掌控的電台進行的，而與江西聯繫的電台是通過中共上

海中央局較小功率的電台進行的。由此，我們才可以從前些年俄國的解密檔案看到當年周恩來（莫斯科文）、王稼祥（科穆納爾）、任弼時（布林斯基）、朱德等給臨時中央的電報，以及博古（波戈列洛夫）、張聞天給莫斯科的電報。

莫斯科為保障與在上海的中共領導機構、國際代表以及與江西蘇區的電訊聯繫，還有另一條最安全、「最可靠」的聯繫管道，這就是蘇聯工農紅軍參謀部第四局直屬機關與其在上海的秘密機構的電台，他們用這個管道傳遞最重要的情報和指示^⑧。1932年7月，共產國際就是通過這個電台要求蘇聯軍方在華間諜佐爾格（Richard Sorge）緊急支援上海臨時中央一萬美元，當時上海臨時中央已有四個月沒有從莫斯科得到經費。

但是這並不能挽回中共在上海等城市的整體性失敗。正是在博古領導黨的時期，中共在上海等城市中的組織，遭到國民黨毀滅性的破壞：1931至1935年，大批中共要員投降自首，甚至上海中央局的兩任書記李竹聲、盛忠亮（都是所謂「二十八個半」的成員）在1934年6月和10月分別被捕後也向國民黨投降。國民黨在10月後還破獲了在上海的共產國際的大功率電台，以及上海中央局聯絡蘇區的較小功率的電台，使得與莫斯科和江西蘇區的電訊中斷（此時，中央紅軍已經開始突圍轉移）。國民黨大量收編前中共人士，「中統」一半人員為「轉變」份子，依靠這批人，國民黨又抓捕了更多的共產黨人，以致惡性循環，

中共在城市的失敗，原因是國民政府在這一期處於上升階段，國人對中共無多同情。另外，中共在農村的激烈行動經國民黨曝光，嚇壞了中產階級和知識份子。

直逼得中共在上海不能立足。國民黨以「共」制「共」的策略大獲成功。

中共在城市的失敗，其客觀原因是國民政府在這一期處於上升階段，國人對中共無多同情，更少支持。另外，中共在農村的激烈行動經國民黨曝光，嚇壞了中產階級和知識份子。1930年代初的中共，只關注「下層統一戰線」，對高舉全民族抗日旗幟的重要性尚認識不足，也影響國人對中共的觀感。幾年後，〈八一宣言〉發出，情況才好轉。

由於上海太危險，「黨的領導中心幾乎沒有可能在上海存在」。1932年11月2日，王明給聯共(布)駐國際代表團寫信，請求幫助將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往中央蘇區^⑧。12月3日，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討論通過王明的建議，同意將中央、團中央和全總遷往江西蘇區^⑨。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33年1月，博古和陳雲進入中央蘇區。

二 從博、毛、周鼎立到毛獨大

博古到達中央蘇區後，首要問題是調整或處理和毛的關係，確立中央權威。毛是江西蘇區開創者和紅軍的主要締造者，蘇聯和國民黨都因此重視他。1931年11月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批准兩項任命：一是批准中共臨時政治局成員名單；二就是批准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毛為蘇區中央局書記^⑩。然而，江西時期的博、毛、周尤如東漢末年的魏、蜀、吳，各有所恃，

卻無一方佔絕對優勢，只能鼎足而立：

博古，有「總書記」的名號，也有俄國人支持，對毛的「野心」有警惕，但不懂軍事，因而喪失了在最重要問題上的發言權，只能依靠李德和周恩來。

毛澤東，有名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會主席)，兼有國際聲望，此為毛的巨大無形資產，又是軍政雙才，有主見，也有「狠」勁，更有強烈的領袖欲，但在一些軍事問題上與莫斯科意見相左，對留俄派整體輕蔑。博、周聯合後，毛暫時受挫，共產國際雖然對毛的「避敵」、「右傾」(「規避打大城市」，「遇敵就跑」)有批評，但又看重毛的軍事才華，毛隨時可能因局勢變化而東山再起。

周恩來，掌軍權，在黨、軍都有雄厚基礎，性情和善，無領袖欲，甘做輔助，對毛、博皆親善，在博、毛之間，無論傾向哪邊，都會影響大局：若支持博，中央就可發號施令；如支持毛，博古就是「漢獻帝」，只能拱手交權。

相比於創立了江西根據地、又具有國際名聲的毛，博古等不僅名氣不響，更是外來戶。周恩來進入江西蘇區早，1932年1月就到了瑞金，國民黨判斷周與毛將有大的矛盾：「足與毛對抗者，唯一周恩來，周之能力，固不及毛澤東，但因共黨之軍事工作，歷史上即由周一人包辦，故在匪軍中，周恩來之力量，殊不可輕視。」^⑪「中統」的上述描述，基本正確，但國民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們只看到周、毛矛盾的一面，卻沒看到周、毛共

博古有「總書記」的名號，也有俄國人支持，對毛的「野心」有警惕，但不懂軍事，因而喪失了在最重要問題上的發言權，只能依靠李德和周恩來。毛澤東在一些軍事問題上與莫斯科意見相左，對留俄派整體輕蔑。

同的一面，這就是他們都要對付國民黨，都關注怎麼打破國軍對蘇區的軍事圍剿。

周雖有軍隊的擁戴，卻不是梟雄類的人物，他比較早就知道毛的軍事才華，自知軍事才能不及毛。至於項英，更是缺少軍事領導的能力。李德進入蘇區後，周認定毛的軍事主張明顯比李德高明，所以對毛一向遷就。周雖是頂了毛的位置，擔任了蘇區中央局書記一職，卻以「軍事第一」為藉口，基本在前線處理軍務，黨的許多事放任不管，也就減少了和毛的衝突，這是周的「聰明」之處。

博古聰明能幹，比周年輕，但缺乏周的靈活性或妥協性，更沒有毛那般成熟、老到。博古以前雖然和毛沒有直接打過交道，但是對毛還是有所了解。1931年春在上海，他曾接待過來告毛狀的贛南共青團代表，知道毛的「肅AB團」及「富田事變」的原委，以後也知道毛的「右傾避敵」，孤高自傲。但莫斯科一再要求中國黨尊重毛，所以博古對毛的態度是矛盾的：當面是客氣和克制的，盡量避免和毛的直接衝突；同時又是反感的，其主要原因就是毛藐視中央，藐視從莫斯科回國的同志。

毛的這種藐視，從1931年春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進入蘇區時就有了，而博古所面臨的毛的藐視尤甚之，是博古進入蘇區後面臨的頭等壓力，因為他沒有經過中央委員的台階，一步就當上了黨的總負責。甫進入蘇區的博古沒有威信，全靠周恩來的扶持和配合，為了確立中央權威，也是為了貫徹國

際進攻路線，博古到達後就抓住兩件事：一是大張旗鼓反「羅明路線」；另一件是靜悄悄的，這就是改組黨和軍隊的領導層，將莫斯科回來的同志派去軍隊擔任要職，如派楊尚昆去三軍團任政委，派朱瑞去一軍團任政治部主任等。1932年9月30日，周恩來為書記的蘇區中央局在給臨時中央的電報中批評毛提拔幹部是從私人關係出發^⑩。毛固然有這些問題，可是博古等在用人方面何嘗沒有傾向性？

毛的自傲與其極強的自信心相聯繫。1935年初，國民黨就說過：「毛澤東為一自信力極強之人。」^⑪他素有大志，有極高的自我體認，在江西滾爬幾年，對當地民情、地情有深入了解，這是其他任何領導人所不及的，所以他自視甚高，脾氣大，語多譏諷，瞧不起博古、更瞧不起洛甫（張聞天），對留俄派，是整體看不起。「中統」當時的分析可謂一語中的：「陳紹禹〔王明〕藉國際代表米夫之奧援，居然為偽總書記，其資望能力學識氣度，更不足論。毛澤東實係輕視之而非畏懼之。」^⑫

留俄派也確有被毛輕視的地方。站在毛的角度，他們在上海灘混不下去跑到毛的地盤上來，一來就指手畫腳，既然這麼有能耐，怎麼不在上海混呢？既然都是響噹噹的布爾什維克，怎麼一被國民黨抓住就叛變呢？僅幾年，被抓叛變的「二十八個半」就達十三人之多^⑬，這讓毛怎麼看得起他們呢（因信息不通，毛當時並不了解「二十八個半」被捕叛變的具體情況，但他知道顧順章、向忠發叛變之事）？

或許周恩來知道革命是不能戴白手套進行的，自己既然缺少那種「大手筆」的氣質，而毛則有這種做革命領袖不可或缺的氣質和膽魄，那就不應批評毛的「肅反」錯誤了。

毛被趕出軍隊後，博古等對毛留有餘地，念其開闢根據地有功勞，團結他一同工作，毛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在寧都會議後「小病大養」，使博、周非常難堪。

在博古這邊看來，毛利用肅反清洗大批同志，實屬「個人野心家」（頁122），博古的這個態度與莫斯科明顯不同，共產國際並沒有就此問題批評毛。可能是因為博古身處蘇區，與毛有較多的接觸，對毛的負面性格體會較深，才會對毛有此評語。但是周恩來卻不這麼看，也從沒使用這種語言評價毛。周固然不會如毛這樣去打「AB團」，但他理解毛如此做在客觀上促成了江西紅軍的統一，故稱之為「大手筆」（頁128）。或許周恩來知道革命是不能戴白手套進行的，自己既然缺少那種「大手筆」的氣質，而毛則有這種做革命領袖不可或缺的氣質和膽魄，那就不應批評毛的「肅反」錯誤了。

有了莫斯科和周恩來對毛的偏袒，即使博古、項英對毛的「肅AB團」有意見，中央內部也沒有形成批評毛肅反錯誤的決議。莫斯科雖然對毛的「右傾」有所批評，但看重毛的軍事才能，博古就只能聽莫斯科的。毛被趕出軍隊後，博古等對毛留有餘地，念其開闢根據地有功勞，團結他一同工作，毛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在寧都會議後「小病大養」，使博、周非常難堪。

毛之桀驁不馴，博、周無可奈何。1945年，蔣介石在重慶見過毛後在日記中評論毛：陰陽怪氣，棉裏藏針^①。這個觀察可能不錯，因為和毛有過較多接觸的民盟人士周鯨文也認為毛的性格屬「陰柔」^②。毛不是直率之人，儘管他很喜歡性格直率又聽話的人。毛還有喜歡罵人、發脾氣的另一面，但是國民黨方面並不了解，因為毛罵人多在黨內。楊尚昆回憶毛因黨內同志反對

他和江青結婚，「經常開會就罵」，「說我無非是吃喝嫖賭，孫中山能夠，為甚麼我不能夠？」^③

毛，非常人也，意志力極堅定，自信心極強。從秦書中，我們還看到毛有濃厚的山大王作風，傲視一切，一人說了算。江西時期，周恩來每次開軍事會議，都得看毛的眼色（頁12），否則毛就自說自話，海闊天空，甚至一走了之。龔楚的《我與紅軍》對此也有描述，兩書可形成對照。

楊尚昆在1986年回憶張聞天時也多次提到毛的負面性格問題，如極左，十分多疑，對權力特別看重，記性也非常好，誰反對過他，記得一清二楚^④。楊尚昆說得非常客觀，事實就是這樣。毛可以讓別人吃冤枉，他寫於1930年的〈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批評那些在「打AB團」中身受酷刑亂咬口供的同志「不能經得住考驗」，他寫道：縱是冤枉，也有被洗刷的一天。但他自己是一點冤枉也不能吃的，他在江西受委屈沒幾年，卻倒苦水四十年，從延安講到北京，從中國人講到外國人。早期元老多了解他，因此至延安整風時期，毛提拔一些對江西蘇區歷史不了解的人，如劉少奇系的彭真等，在他們幫助下造成「勢」，使了解內情的人從此噤口。一段時間，延安最有權勢的就只有四人：毛、劉、康生、彭真^⑤。

在這幾人中間，毛是領袖，劉等是學生，他們之間不是平行的關係，而是上下的關係。1943年毛在劉少奇給續範亭的一封信談人性善惡問題的長信上做了大量批註，對劉進行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中國古代

哲學史的啟蒙教育，劉如同一位小學生。而毛暫時讓周恩來出局，並接受康生等的批判，是為了將來更好地用他，因為毛也離不開周。

毛一時冷凍周恩來，乃是因為周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當家人，最讓毛不舒服的王明、博古，就是周扶上台的。1931年6月，是周和共產國際顧問商議，增補王明為常委；而王明去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也是周向國際顧問建議的。由博古擔任臨時中央總負責，就是他和王明兩人決定的，這在組織手續上是嚴重欠缺的。博古年輕，世故不深，也可能是深感責任重大就坦然挑起了領導中共的擔子，卻沒有意識到王明、周恩來的這項任命在「法源」上有其先天不足，將會給他本人和黨帶來許多麻煩。果如此，在延安整風期間，毛就提出王、博「篡黨」的問題，經過一番周折，才把王、博問題視為「黨內問題」。

現在真相大白：王明、周恩來對臨時政治局人員的安排是先斬後奏的。以往的文獻都說，臨時政治局得到莫斯科的批准，這不錯，但是新近披露的共產國際檔案顯示，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對中共臨時政治局的人選是有疑問的。1931年10月3日，由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書記皮亞特尼茨基 (Iosif Piatnitsky) 簽署的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第185號記錄中有以下的話^②：

詢問中共中央，這個臨時政治局是由哪個機構選出來的？為甚麼沃羅夫斯基同志〔即黃平，1932年夏被捕叛變〕沒有當選，政治局是否一

致選出的；如果是，那麼我們對其組成人員沒有意見。

事實是，在當時的緊迫環境下，王、周沒有召開政治局會議來決定臨時政治局的名單，有關人選就是王、周兩人商定的，其他政治局委員都不知道，這麼重大的事，就由他們兩人決定了。幸而延安整風期間，毛手中還沒有掌握這份檔案，否則周恩來、王明、博古將為此受到更多的責難和懲罰。

共產國際檔案證實，在博古去蘇區前，周恩來和蘇區中央局的絕大多數成員都反毛。1932年5月3日，周恩來、王稼祥、任弼時、朱德在瑞金聯名給上海臨時中央寫信，批評毛不打大城市的主張是「百分之百的右傾機會主義」，並表示他們「決定同毛澤東的錯誤進行鬥爭」^③。

6月，蘇區中央局給上海臨時中央發電報說，他們在傳閱了共產國際5月15日關於毛的電報後，召開了中央局會議，「堅決揭露了以前的錯誤」。電報說，毛「在會上表現出很好的態度，深刻承認了自己以前的錯誤」，而他們的「討論是同志式的，只限於中央局委員之間」，「這並不妨礙毛澤東的領導工作」。中央局並表示，會議之後「不會再有任何衝突」^④。

然而毛的所謂「承認錯誤」是表面的，9月30日，蘇區中央局再發電報給臨時中央，說毛忽視黨的領導，堅持自己的「機會主義」的軍事主張，和毛在一起的周恩來很難貫徹蘇區中央局的意見等等，因此蘇區中央局請示上海臨時中央，他們要把毛調回後方主持政府工作^⑤。

以往的文獻都說，臨時政治局得到莫斯科的批准，這不錯，但是新近披露的共產國際檔案顯示，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對中共臨時政治局的人選是有疑問的。

周恩來最早發現毛之才能。周製造了毛「用兵如神」的輿論，幫毛樹立威信。正是由於周的棄博投毛，才使得原有的以黨統軍的格局大崩解，毛才得以一股獨大！

正是在這背景下寧都會議召開了，毛的軍權被周恩來接管。然而在對毛的人事安排上，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和周恩來為書記的蘇區中央局的意見並不一致，博古支持批評毛的「右傾」，但反對將毛調離軍隊^②。共產國際駐上海代表埃韋特和博古持同樣態度。10月8日，埃韋特在給共產國際書記的信中明確提出，蘇區中央局未告知國際代表，就自主作出了批評毛和撤銷毛軍中職務的決定。他在信中抱怨道，蘇區中央局沒有得到共產國際書記的同意，「是不能做出這種決定的」^②。他甚至說，蘇區中央局干預蘇區軍事行動的領導，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那是完全錯誤的」^②，這充分說明，蘇區中央局成員（為首的就是周恩來），他們對毛的態度比博古、比共產國際代表激烈得多。

幾個月後，1933年1月，博古到達江西蘇區。在上海，雖然他同意蘇區中央局對毛的批評，但是他和毛沒有直接衝突。進入蘇區後，他和毛的關係很快就緊張起來。博古的個人風格是敢作敢當，周恩來又予以配合，中央權威在蘇區才得到真正確立。所以毛在延安整風時指責周說：「經驗宗派」扶持「教條宗派」，並不冤枉。對於蘇區失敗，周也有責任。因為周提出的「六路分兵拒敵」主張（頁81-82），導致了蘇區軍事全面危機，最後迫使紅軍突圍轉移。

但是周恩來等談不上有一個「宗派」。當初成立臨時政治局，把博古「扶上去」的是周恩來，現在動員博古下台也是他！而且是周最早發現毛之才能，為毛的復出做了大

量鋪墊工作，幫毛從孤立和自我孤立狀態下解放了出來。是周向博古建議召開六屆五中全會，使毛從政治局候補委員升任政治局委員。長征後，又通過幾次會議，恢復了毛的發言權。在遵義會議前夕，臨時調換中央警衛營（頁130-31）；在會上，又臨時改變原和博古商定的會議程序，支持毛和張聞天的發言，會後又成功說服博古下台交權。其後，毛的軍事領導因土城戰鬥失敗出現危機，又是周幫了大忙。三渡赤水後，部隊怨言多，周開始宣傳毛如何神機妙算，封鎖軍委二局一科科長曹祥仁破譯敵人密碼一事，毛再親自主管一科，直接掌電訊往來的秘密（頁151）。周製造了毛「用兵如神」的輿論，幫毛樹立威信（頁152）。正是由於周的棄博投毛，才使得原有的以黨統軍的格局大崩解，毛才得以一股獨大！

周恩來一生服膺黨內強者，1935年前，服從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後又服從於毛，儘管中間有反覆。周一向對毛妥協，1931年之前，毛在江西「當家」，周去江西後，毛還是紅一方面軍前委書記，毛與周的權責模糊，周雖是蘇區中央局書記，理應是第一號人物，但毛掌軍隊，使得周很難主持全面工作。國民黨當時所看到的，就是周抵達後，成立了蘇區中央局，「在匪區形成兩個統治權」，即「周的黨權和毛的政權」，他們由此推論毛與周將由此而爭^②，卻不知道毛的紅一方面軍才是蘇區的重中之重。周雖為中央局書記，卻一切從黨和紅軍最高利益出發，根本不願和毛爭。直到1932年10月寧都會議後，毛的軍

權被拿下，周才掌權。也就是在寧都會議後的一段時間裏，周不再請教毛了，使得毛特別壓抑，「小病大養」，而周又放手不管，只有年輕的博古傻乎乎去得罪毛。

周何以一向對毛妥協？一則是周的性格本來就具妥協的因子；二則因為王明、博古有莫斯科支持。周到蘇區後發現毛的軍事才能和統帥潛質，加之莫斯科又來電，要求團結毛，發揮毛的軍事才能，周就對毛多有扶助。1937年11月末，王明從莫斯科回來，召開延安12月政治局會議，王明的背後是斯大林，周就站在王明一邊。然而1935年後，共產國際工作方式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一般不再直接干預各國共產黨，於是毛的腰杆又慢慢硬起來了，到這時，周就更多順着毛。

從江西蘇區時期到1976年初周恩來去世，他對毛的妥協使毛可以為所欲為，周等為了黨和軍隊的利益，對毛一再妥協，這其中周起的作用最大。周知道毛性格上的缺點，似乎也希望政治局內有制衡毛的力量，可一旦有可能形成這種苗頭時，也是周把它掐滅。1938年在武漢，他勸張國燾時說過此類話，張知道這不可能，還是沒聽周的勸告，堅持出走，投靠了國民黨。

朱德、陳毅等也是知情者。朱德雖對毛也多有妥協，但與周有很大的差別。1959年廬山會議後，陳毅面對面批朱德，批張聞天。1966年5月23日，又當面開重炮批朱德。周恩來知道他必須發言，也在這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當面批了朱德，只是他批評的口氣比較緩和，在談到朱德所犯的歷史錯誤時，也

把自己放了進去。陳、周等批朱德自然是為了取悅於毛。如果說建國前，周等的檢討、自貶是為了打敗國民黨，奪取共產黨的天下而突出毛的威信，尚情有可原，他們看到毛天縱神明，文韜武略，早已服輸；那麼在這之後，就是懼怕毛。

為了歷史上幾次與王明、博古的合作，周恩來幾乎檢討了大半輩子。文革前周恩來去哈軍工視察，校方介紹在那兒學習的高幹子女與周見面，周對林彪的女兒等親切有加，獨對博古之女十分冷淡。

被毛提拔起來的劉少奇，到了1960年代初，看餓死人太多，單槍匹馬，對毛稍有點抗爭，要求對百姓實行讓步，此是劉一生中對國家對民族做出的最大貢獻，但多數時候，劉對毛也是處處衛護。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回憶說，1960年代初，毛的老秘書葉子龍私下對毛多有不敬議論，某次劉少奇聞之大怒，下令槍斃葉，後經周恩來、彭真等一再勸說，才沒有執行^⑩。最近，這一段歷史由劉少奇之子劉源說出來，不僅可和李醫生所述互為佐證，而且還提供了更多的細節。劉源說，葉子龍是「近而不恭，熟不拘禮」，因被下放而對毛發牢騷。葉子龍發了甚麼「牢騷」，劉源沒有說，只說彭真在政治局會議上「順口說笑了一句」，引致劉少奇大怒，兩次下令：「彭真，把葉子龍抓起來，槍斃！」此事後來不了了之。劉源還說，文革中葉子龍聞劉少奇「反毛」，始終不信，王光美出獄後第一個前來探望的就是葉子龍^⑪。

周、劉等的幫忙，使毛躊躇滿志，率性而為，常常指鹿為馬，指

為了歷史上幾次與王明、博古的合作，周恩來幾乎檢討了大半輩子。文革前周恩來去哈軍工視察，校方介紹在那兒學習的高幹子女與周見面，周對林彪的女兒等親切有加，獨對博古之女十分冷淡。

1949年後就是毛的乾綱獨斷，他幾乎讓所有人都感意外，從他的戰友、民主黨派領袖到大、小知識份子，都從自己的想像和願望去揣度毛，結果毛讓他們的希望落空。

白為黑。到了1960年代後，他明知大躍進闖下大禍，還理直氣壯，毫無任何道德障礙，整治正確的彭德懷，劉還是配合毛，最後整到自己頭上，劉的嘴巴被毛和自己雙雙封住，正是勝利者寫歷史。

在中國歷史中，開國皇帝搞權謀，是最為平常之事，只是中國共產革命發生在二十世紀，自有新的評判標準，如不是這樣，也就無話可說了。中共自五四而來，三、四十代還帶有不少五四痕迹，抗戰初期大批知識份子的捲入，將青春、理想、熱情和生命都獻給了這場革命，延安整風沉重打擊了黨內存留的五四個性自由的精神，他們怎麼知道紅太陽下也有「陰影」？1949年後就是毛的乾綱獨斷，他幾乎讓所有人都感意外，從他的戰友、民主黨派領袖到大、小知識份子，都從自己的想像和願望去揣度毛，結果毛讓他們的希望落空。

註釋

- ① 陳誠：《陳誠先生回憶錄》，第四卷，〈國共戰爭〉（台北：國史館，2005），頁58、59、54。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3）——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北京：中共黨

史出版社，2007），頁19；254；263；132；283；285；225；253；65；210；39-40；147；148；164；210；214；217；218。以下簡稱《聯共（布）檔案（13）》。

⑲ 〈前言〉，載《聯共（布）檔案（13）》，頁9。

⑳㉑㉒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中國共產黨之透視》（台北：文星書店，1962），頁156；27；157；156。

㉓ 萬亞剛（前「中統」資料室「蒼廬」負責人）：《國共鬥爭的見聞》（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頁268。

㉔ 楊天石談蔣介石的內容，參見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2009年4月10日，引自<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64&id=2760447>。

㉕ 周鯨文：《風暴十年：中國紅色政權的真面貌》（香港：時代批評社，1962），頁136。

㉖㉗ 張培森整理：〈楊尚昆1986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炎黃春秋》，2009年第3期，頁32；30。

㉘ 參見李新著，陳鐵健整理：〈中共北方局整風記〉，載《流逝的歲月》（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頁191。

㉙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頁322。

㉚ 劉源：〈漫談黨內民主與團結——在院黨委全會上的談心〉，《香港傳真》，2009年第8期，頁7。

高 華 南京大學、華東師範大學
歷史系教授。